

清代名人傳略



〔美〕A·W·恒慕义主编

清代名人傳略

(中)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西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本世纪4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恒慕义博士主编的一部颇享盛名的中国清代大型人物传记辞书。原书分为两卷，分别于1943—1944年在美国出版，此次翻译出版，分为上、中、下三册，约130万字。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清代八百余位人物活动情况的详尽具体介绍，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300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勾画出了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构成了一部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本书具有颇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对研究我国清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 代 名 人 传 略 (中)

[美]恒慕义 主编
中国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125 字数：380,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5-00207-4/K·26 定价：6.20元

汉译本中卷简介

本卷共收人物传记208篇，概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清代乾隆、嘉庆两朝重要人物。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多年的休养生息，耕地和人口大量增加，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1786年，国库积存已是弘历即位之初的两千四百万两的三倍（见《弘历》）。正因国力雄厚，1755年之后，才有十次重大战役，即所谓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准战役（1755、1756—1757，见《阿睦尔撒纳》）；平定南疆战役（1758—1759，见《兆惠》）；两次金川战役（1747—1749，见《张广泗》、《傅恒》；1771—1776，见《阿桂》）；平定台湾叛乱（1787—1788，见《柴大纪》、《福康安》）；征缅之战（1766—1770，见《傅恒》、《明瑞》）；征讨安南之战（1788—1789，见《孙士毅》）；两次征讨廓尔喀之战（1790—1792，见《福康安》）。

这十次战役中对后世最具影响的是两次平准战役及平定南疆之役。平准之后，厄鲁特残部发往黑龙江（见《兆惠》）。为厄部所迫，1616年前后远徙俄国境内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蒙古乃得于1772年迁回我国。清政府将该部安置在乌鲁木齐及塔尔巴哈台地区（见《舒赫德》），定居至今。这三次战役之后，清廷在伊犁设将军，乌鲁木齐设都统以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区，1884年更设新疆行省（见《兆惠》）。

弘历多才多艺，提倡文学艺术，影响所及，诗坛文苑人材辈出。诗坛有沈德潜与袁枚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别（见《沈德潜》、《袁枚》）；文坛则有桐城派与阳湖派（见《姚鼐》、《张惠言》、《恽敬》）；画家有董邦达，书法家有张照、刘墉、邓石如等（见《董邦达》、《张照》、《刘墉》、《邓石如》）。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藏书家（见《鲍廷博》、《范懋柱》、《黄丕烈》、《黄启淑》）。弘历也很喜爱西方艺术，他虽然继续奉行其父的禁教政策，但仍然召来具有天文历法、绘画、建筑、音乐、机械制造等各种专长的传教士，在钦天监及宫中供职。圆明园中的西洋建筑即出自彼等之手（见《弘历》）。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清朝内、外政策有如下变化：

1757年，他下谕只准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其后并曾无理圈禁英商洪仁辉（Flint）三年，又对前来广州贸易的西方商人加以种种限制（见《李侍尧》）。为了寻求扩大贸易的机会，改善英商在华处境，英国政府经过充分准备，于1793年派来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华（见《弘历》、《和珅》、《松筠》），但英使毫无所获，空手而归。二十余年后，1816年，英国政府为了同样的目的再次派使臣阿美士德（Amherst）来华，因英使拒绝行磕头礼，不堪清廷官员的无礼摆布，拒不觐见嘉庆皇帝而被立即遣回广州（见《颙琰》）。两国关系从此陷于僵局。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严重影响了对外关系。

对内则加紧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借修《四库全书》（见《弘历》、《纪昀》、《朱筠》、《陆锡熊》、《陆费墀》）之名，搜罗全国图书，凡有碍于清王朝统治者尽皆焚毁；大兴文字狱（见《尹嘉铨》、《王锡侯》、《齐周

华》、《徐述夔》、《沈德潜》，但乾隆初年并非如此（见《谢济世》）。

清代汉学到了乾、嘉之际，人材济济，硕果累累。由于考据学（见《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钱大昭》）、训诂释词之学（见《王念孙》、《王引之》、《沈钦韩》）、校勘学（见《卢文弨》）等等学科的巨大成果，乾嘉学者在重新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是空前的。学者们钩沉佚书（见《陈寿祺》），鉴别古书真伪（见《崔述》），校勘版本（见《全祖望》、《赵一清》、《黄丕烈》），从而澄清了汉唐以来典籍正义及注疏中的许多讹误。乾嘉汉学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

论述乾嘉之学是本卷的侧重点，举凡有成就的乾嘉学者莫不收入，戴震与崔述则是重点中之重点。《戴震》一篇除详述戴氏一生学术成就外，并着重阐述他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观点，主张唯物主义观点。《崔述》一篇近9000字，是中卷篇幅最长者，详述这位近代疑古学派开山祖的一生学术活动及其开拓性的伟大贡献。

乾嘉学术不仅限于上述，洪亮吉在当时即已预见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见《洪亮吉》），郝懿行又是一位有志于动植物学的自然科学家（见《郝懿行》）。郝氏早于英国的达尔文（1809—1892），当时中英两国的社会条件相去太远，致使郝氏之学无法与达尔文媲美。

读者可在《袁枚》、《李汝珍》、《龚自珍》、《俞正燮》等篇中看到一种历史现象：乾嘉时期的众多文人学者不约而同地关心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乾嘉年间的学术成果也影响了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今文经学家刘逢禄是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他为后代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等人的“托古改制”提供出理论根据（见《刘逢禄》）。

本卷许多篇传略别具一格。例如：《范懋柱》对藏书家范懋柱的生平事绩介绍仅只寥寥几笔，却用大量文字详述建于明代的宁波天一阁从创建直到1936年这四百年间的兴衰历程，乃是一篇专门研究天一阁的学术论文。《邓石如》、《徐大椿》两文则兼及书法与医学的流派。

弘历晚年（1776—1799）宠信权臣和珅，朝廷纲纪败坏，官场贿赂公行（见《和珅》）。1781年及1784年甘肃回民两次起义（见《阿桂》、《李侍尧》、《福康安》）。1795—1796年黔湘两省苗民起义（见《颙琰》、《福康安》、《和琳》）。1795年起，白莲教在湖北、四川起义，反抗官府。这场战争持续近十年，波及川、鄂、陕、甘、豫五省，耗尽了清王朝国库，也中饱了将帅们的私囊（见《和珅》、《和琳》、《福康安》、《孙士毅》、《额勒登保》）。1796年2月，颙琰继位之后，仅1796—1801年用兵即耗去国库一亿两白银（见《颙琰》）。东南沿海连续十年（1801—1810）征剿海寇（见《颙琰》、《李长庚》）。1813年天理教徒在北京和河南滑县同时起义（见《那彦成》）。1826—1827年西北边境有张格尔之乱（见《长龄》）。弘历逝世之前，鼎盛的清王朝已呈衰败之象（见《颙琰》），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内囊已空（见《长龄》）。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的英国却日见强大。战胜拿破仑之后立即着手大力发展东方贸易（见《颙

琰》)。早在1820年，公羊学派的学者、有志于改革的龚自珍即已预见到东南沿海将有事端，龚氏此议及其它改革意见，清廷无人理睬(见《龚自珍》)。二十年后，英国的大炮终于轰开封建中国锁上加锁的大门。中国历史从此转入另外一章。

张 广 学

1987年11月

目 录

徐文靖	(1)	房 鸞	(54)
方 葛	(2)	郑 變	(55)
惠士奇	(6)	徐大椿	(57)
黄叔琳	(7)	王安国	(60)
沈德潜	(10)	陈宏谋	(61)
顾栋高	(12)	尹继善	(63)
陈世倌	(14)	杭世骏	(66)
哈元生	(16)	惠 栎	(69)
梅穀成	(18)	梁诗正	(72)
史贻直	(20)	齐周华	(74)
孙嘉淦	(22)	方观承	(76)
高 斌	(24)	董邦达	(79)
阿克敦	(27)	刘统勋	(80)
何国宗	(28)	吴敬梓	(83)
岳钟琪	(31)	陈兆容	(85)
钱陈群	(34)	陈大受	(87)
沈 彤	(36)	秦蕙田	(89)
马日琯	(37)	沈廷芳	(91)
德 沛	(39)	全祖望	(94)
谢济世	(41)	傅 清	(99)
张广泗	(43)	徐述夔	(101)
班 第	(46)	励宗万	(103)
卢见曾	(48)	牛运震	(104)
张 照	(50)	齐召南	(106)
黄廷桂	(52)	高 晋	(108)

蔡 新	(110)	和 琳	(186)
阿睦尔撒纳	(111)	柴大纪	(187)
兆 惠	(115)	海兰察	(190)
钱 载	(120)	刘 塘	(192)
赵一清	(121)	汪 宪	(194)
傅 恒	(124)	范懋柱	(196)
刘 纶	(126)	江 声	(199)
舒赫德	(127)	蒋良骐	(201)
尹嘉铨	(131)	王鸣盛	(202)
弘 历	(133)	梁国治	(204)
裘曰修	(141)	梁同书	(205)
王锡侯	(143)	戴 震	(206)
于敏中	(144)	纪 昙	(216)
潘振承	(148)	陆费墀	(222)
李侍尧	(150)	蒋士铨	(224)
查 礼	(155)	王 昶	(227)
袁 枚	(157)	赵 翼	(231)
卢文弨	(161)	汪启淑	(232)
阿 桂	(163)	钱大昕	(236)
程晋芳	(168)	鲍廷博	(241)
顾奎光	(169)	余萧客	(243)
庄存与	(170)	朱 笕	(244)
钱维城	(173)	周永年	(246)
金 简	(174)	毕 沔	(248)
富 德	(177)	王文治	(252)
郝 硕	(178)	严长明	(253)
孙士毅	(180)	孟超然	(254)
福康安	(183)	朱 珩	(256)

汪辉祖	(258)	梁玉绳	(333)
姚鼐	(261)	洪亮吉	(334)
翁方纲	(263)	吴锡麒	(337)
陆锡熊	(267)	永璇	(339)
李调元	(269)	赵怀玉	(340)
钱塘	(273)	额勒登保	(342)
永忠	(275)	黄景仁	(346)
段玉裁	(276)	和珅	(348)
明亮	(279)	祁韵士	(352)
明瑞	(282)	刘台拱	(354)
章学诚	(284)	李长庚	(355)
永璇	(290)	孔广森	(359)
余集	(291)	章宗源	(360)
钱沣	(292)	永瑆	(362)
彭绍升	(294)	铁保	(363)
崔述	(295)	松筠	(365)
董诰	(308)	法式善	(367)
勒保	(310)	孙星衍	(370)
钱棨	(314)	孙玉庭	(374)
福隆安	(315)	张海鹏	(376)
福长安	(317)	曹振镛	(379)
邵晋涵	(318)	石韫玉	(381)
邓石如	(320)	凌廷堪	(383)
钱大昭	(321)	恽敬	(385)
王念孙	(323)	郝懿行	(387)
汪中	(326)	姚文田	(389)
武亿	(328)	长龄	(391)
德楞泰	(330)	颙琰	(395)

钮树玉	(402)	李兆洛	(454)
孙原湘	(403)	伍秉乾	(457)
张惠言	(405)	朱 璞	(458)
朱 理	(407)	陈寿祺	(460)
江 蕃	(407)	英 和	(463)
杨遇春	(409)	沈钦韩	(467)
严可均	(411)	俞正燮	(469)
焦 循	(414)	陈文述	(471)
黄丕烈	(419)	包世臣	(473)
李汝珍	(421)	刘逢禄	(475)
沈 复	(423)	顾广圻	(478)
张问陶	(425)	乌尔恭阿	(482)
那彦成	(427)	陶 澈	(483)
李富孙	(432)	昭 涇	(484)
阮 元	(433)	徐 松	(487)
舒 位	(440)	冯登府	(489)
张 琦	(442)	郭尚先	(491)
永 鎮	(444)	程恩泽	(493)
王引之	(446)	张金吾	(494)
臧 庸	(448)	龚自珍	(497)
朱桂桢	(451)	汪 端	(502)
许宗彦	(452)	绵 恺	(503)
戴敦元	(453)	奕 珪	(504)

徐文靖（字位山、禹尊），1667—
徐文靖

1756年。经史学家。安徽当涂人。1723年始中举。十三年后（1736），甘汝来（见李绂条）荐应博学鸿词科（见刘纶条），不第。1744年，张鹏翀（见张鹏翮条）荐徐文靖于高宗皇帝，并将徐的两部经学著作及其诗作进呈御览。1750年，安徽巡抚卫哲治（字我愚，号鉴泉，1702—1756）复就徐文靖在经学上的成就荐于高宗皇帝。次年，徐文靖应会试，不第。但以年高之故，赐翰林院检讨。此后，徐氏晚年一直在故里“翠螺书院”主讲。

徐文靖著作十之八九已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水灾和政治变故中散佚无存。但《徐位山先生六种》仍然行世，此书收有徐氏六种著作，每种刊行年月不同。第一部名《天下山河两戒考》十四卷，1723年刊行，治“分野”之作。“分野”是古代试图用星宿位置来划分地理疆界的原始科学。此书前八卷订正并注释较早的一部研究“分野”之作，即载于《新唐书》31/13b的唐代僧人一行之作。后六卷则是对晋、隋及宋各代史书所载史料的发掘，并探讨与徐氏同代的西方人所持的理论。此外，该书附有24帧天文及地理图表。第二部名《竹书统笺》十二卷，约刊印于1750年，是对《竹书记年》（见郝懿行条）一书所作的笺注。第三部名《禹贡会笺》，十二卷，1753年刻印，是对《书经》禹贡一章所作的笺注。书中附有一份载于《书经》的河流山脉名录表及18帧附有解说的舆图。该书与胡渭（见该条）同类著作相比，优于胡著，因徐深入探讨胡所未知的许多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则较逊于胡，因徐偏信《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第四部名《管城硕记》，三十卷，约刊于1744年，是徐氏读经、史、子、集各类著作的札记。第五部名

《周易拾遗》，十四卷。徐氏于八十九岁时撰写此书，作序时年已九十（1756），收入《徐位山先生六种》时题名《经言拾遗》，而副以《周易拾遗》。第六部名《志宁堂稿》，或名《诗赋全集》，是徐文靖的诗文集。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490/9a, 3/127/2a; 《当涂县乡土志》(1916)2/31b.]

原著：舒特 翻译：王介山 校订：张广学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望溪），
方苞 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学者，
生于南京附近，一生大半生活在南京，但在明末动乱以前方家祖籍是安徽桐城。他年轻时受教于父亲和长兄方舟（字百川，1665—1701），于桐城和安庆应童子试，选为贡生之后，赴北京入国子监。他的文章迅即誉满京城，颇受在京学者诸如韩菼、李光地、万斯同、姜宸英（见各该条）等人的赞誉。他在北京结识哲学家李塨，并有弟子多人，戴名世即是其一。他在直隶涿州和北京教家馆数年，后又执教江苏宝应。1699年应江南乡试高中解元。1706年他会试中式，将应殿试时获悉母病，乃返家侍奉。第二年父故，遵礼守制。

三年后（1711）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一案爆发，方苞无辜被卷入此案。方与戴同乡，又都有文名，彼此相知有年。方为《南山集》作过一篇序，此外与方毫不相干。但是，方苞的同族方孝标（见戴名世条）著有一部论述吴三桂（见该条）叛乱的书，戴曾援引此书。由于这些原因或其它原因，方氏全

家及方苞均被逮捕下狱。方在狱中镇定自若，学而不辍。1713年狱成，戴坐斩，方苞和全家人均由原籍解来北京入旗为奴，或流放黑龙江。据传李光地珍惜方苞的学识和文才，向皇帝求情，方苞才得免死。

出狱后方苞受命入值南书房（见张英条），未几，改值畅春园（见玄烨条）蒙养斋，编校天文、数学和乐律诸书。方在该处结识徐元梦（见舒赫德条）和顾琮（见顾八代条）两名满人，彼等有志于经学，经常请方讲解礼经。方的同僚中尚有何国宗和梅毅成（见该条）。1722年方充武英殿修书总裁。第二年方及全家获赦，新皇帝世宗准方及全家归原籍桐城。1724年获准离职一年，第二年返回北京，虽有足疾仍回武英殿任职。1731年特受左中允，此职极少授予非翰林出身者。几经升迁，任内阁学士（1733），但方苞以足疾请准留武英殿。同年授教习庶吉士。第二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见董邦达条）。

1735年，高宗即位，第二年命方苞选录明朝和清朝前期的八股文范作为应考学生的标准读本。这部选集共四十一卷，1739年刊行，题名为《钦定四书文》。方苞又曾充任《三礼义疏》总裁（译者按：《清史稿》作副总裁）。正文及注疏刊行于1748年，分别为：《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和《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他擢为礼部右侍郎，但1738年初辞去，继续编修典籍，仍以原衔食俸。1739年武英殿重刊标准本《十三经》及《二十一史》时，方建议采用最佳版本，并刊入何焯（见该条）所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三书的校勘记。方的建议被采纳，何焯未刊手稿因被借用。同年（1739）方因荐举有恩于他的人为官，受到皇上诘责。皇上为此而下的上谕说，他所推荐的人中有两人是他在北京为奴时的恩主。方被解

除一切官衔，但仍准其编修《三礼义疏》以将功折罪。他致仕后不久，授翰林院侍讲衔，在南京家中度过余生（1742—1749）。全祖望为方做墓志铭，哀叹方和李绂死后，当世已无师表。

方毕生致力于学，甚至在服官中仍醉心于文学活动。他的著作（见下）计有三十九种。内收十六种著作的方氏文集《方望溪全集》即抗希堂十六种，在他一生的后三十年中，已由朋辈或弟子多次刊行。其中七篇是论述礼经的，但这些文章比起秦蕙田、郝懿行（见该条）等人的同类之作要逊色一些。他也治《春秋》和《左传》，但却偏重于文章笔法，而不在于书中的道理和史实。他被誉为古文大师和桐城派的奠基人，而深受敬重。他自己无意创立这一派，他死后却被别人尊为此派的开山祖（见姚鼐条）。但是，他的确在1733年选编的《古文约选》一书的序言中强调过他所提倡的这种文章风格。他所选的文章来自汉书、后汉书和唐宋八家之作。唐宋八家即：韩愈（见毛晋条）、柳宗元（773—819）、欧阳修（见邵晋涵条）、苏洵（1009—1066）、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6—1101）和苏辙（1039—1112）。方苞认为，学生诵读这部书就可轻易地找到义法，作八股文就愈加容易。有人声称此书犹如一把钥匙，可以致圣人之教，可以从科场打开功名利禄之门。这就部分地说明桐城派为什么能享有盛名。但是，方苞提倡的义法，其涵义并非方氏独创，早在明朝即已成为一种教人作文章的方法，流行当时。事实是，桐城派真正的开山祖姚鼐（见该条）极力宣扬方氏著作，并把这种文章做法归之于方氏，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方法仍然风行一时。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官高、年长，饮誉海内，也因为他是几位皇帝称许的古文和八股文名家，这与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

干，而姚鼐本人正是桐城人。

方氏几乎没有写过诗。据说是由于他听了一位挚友的忠告。他的第一部文集《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刊行于1746年，后多次重刊。1851年戴钩衡（字存庄，号蓉州，1814—1855）重编此书，并将搜集到的方氏其它文作集为十卷增入，同时附入苏惇元（字厚子，号钦斋，1801—1857）所编方苞年谱。戴所编的这部《望溪先生集外文》1852年又增入补遗两卷。戴和苏都是桐城人，又是桐城派文学家。景仰方苞的人后来又续增两部补遗。

方苞服膺朱熹（见胡渭条）的教导，并多次宣称，他曾劝导过许多学者改变态度成为宋代理学的信徒。李塨长子死去之时，方苞在致李塨的信中说，李家这场灾祸乃是上天对李攻击朱熹的一种惩罚。这种固执的态度是桐城派的特点，桐城派的文学家们只读朱熹的注释和某些人的文章，而诬蔑别的文学作品蛊惑人心。有些人公开指责方的文章，钱大昕（见该条）即其一，他认为方的文章空洞，没有学术价值。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296/3b, 3/69/1a, 4/25/19b, 17/4/48a；苏惇元：《望溪先生年谱》（1851）；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2/1a；《桐城文学撰述考》1/8b，（以上两文均载于《直介堂丛刻》）；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1/17a, 33/14b；马其昶（见方观承条）：《桐城耆旧传》。〕

原著：房兆楹 翻译：张 石 校订：张广学